

中国新闻传播史

杨师群摇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孕)数据

摇中国新闻传播史 杨师群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圆园园愿
摇(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

摇陈昇怨愿原范原范示原范范景缘

摇 I 援中...摇 II 援杨...摇 III 援新闻事业史 原中国摇 IV 援圆缘怨愿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圆园园愿)第 员员员员源号

摇书 名:中国新闻传播史

摇著作责任者:杨师群摇著

摇责 任 编 辑:华摇娜摇朱摇彦摇王业龙

摇标 准 书 号:陈昇怨愿原范原范示原范范景缘· 圆园园愿

摇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摇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圆缘号 摇员愿愿愿

摇网 址:陈昇怨愿原范原范示原范范景缘社

摇电 话:邮购部 远缘缘缘缘 摇发行部 远缘缘缘缘 摇编辑部 远缘缘缘缘
出版部 远缘缘缘缘

摇电 子 邮 箱:陈昇怨愿原范原范示原范范景缘社

摇印 刷 者:

摇经 销 者:新华书店

苑远毫米 伊苑远毫米 摇员开本 圆缘缘印张 摇员远千字
圆园园年 愿月第 员版 摇圆园年 愿月第 员次印刷

摇定 价:猿愿元

摇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摇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摇举报电话 远缘缘缘缘 摇电子邮箱:陈昇怨愿原范原范示原范范景缘社

前摇摇言

1791年,英国人弥尔顿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辞《论出版自由》。他第一次明确提出,言论出版自由是人的一切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因为人在接受智慧方面有“知”的基本权利,书报检查制度是有害的。1820年,英国人穆勒出版了名著《论自由》。他提出,每个人在意识形态领域,都应享有良心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他总结了法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提醒人们注意防范“多数人的暴虐”,保护少数人的权益。“假定全体人类都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要使人类沉默更为正当。”他指出,专制统治使人民不敢说话,使思想家不敢秉笔直言,精神奴役的最大危害莫过于思想枯萎、智力下降、精神怯懦,所以倡导精神与言论自由主要是为了产生智力活跃的人民,这样的社会才会有真正的创造力。

1844年,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方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①他表达了对当局新闻管制的强烈不满。他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一文中强调:“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②同时,恩格斯这样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也就是出版自由。”^③可以说,马克思与恩格斯一生都在为新闻自由而奋斗,反对限制思想的文化专制,要求拥有基于精神太阳照耀下无穷无尽的、千变万化的个体化表达思想自由的个人权利。

“自由”是人权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理念,或者说人的本质就是自由,它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页。

法律的根本精神是一致的。由是观之,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就是人的这种自由本质的实现过程,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一切人的自由。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①《共产党宣言》也是这样提出其理想社会的蓝图:“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说过:“没有新闻自由,就不可能有民主政府。”新闻自由是公民权利的重要保障。陈力丹在《谈谈“绝对的出版自由”问题》一文中理直气壮地论证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绝对的出版自由是常规”,指出:“要求在中国公开宣布没有绝对的出版自由,只实行有限制的出版自由,并以此为自豪,这在理论上是愚蠢的,在策略上也是缺乏政治头脑的。”^②然而,这些基本理念在中国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历史研究与新闻报道的魅力在于用变焦镜头对准某一时期的某一事件,以不同的尺度、从不同的层面观察,进行深入的剖析。历史的实在性在于不断改变焦距时看到的各种景象的综合。新闻报道也同样如此,单方面的一种观点的解说,绝得不出真实的结论。同时,任何一个有价值的见解的形成,应该是通过不受限制的各种思想的辩论,而不是只听取单方面的意见。由此可知,只有在思想自由、文化多元的开放型社会中,人们在各种思想观点的参照比较中作出理性的选择,才能有成效地推动社会的进步。一些重要的思想知识的进步,往往都要靠独立思考,不受主流思潮的影响。在像服从上帝的意志那样服从某个人或多数人意志的地方,这种对真理探索的科学态度是不可能存在的。

然而,翻开有关的历史,目睹以往的脚步,呈现的却是那么多的苦涩与无奈:中国的新闻之路走得极其艰难、坎坷。首先是先天不足,中国古代信息传播基本由朝廷和官府垄断,官文书、官报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新闻检查的严格控制使社会信息闭塞、思维活动僵滞,所谓的“民报”也只是“官报”的翻版,民间非法小报实在微不足道。古代新闻传播的狭隘传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近代社会的愚昧落后。近代报刊业完全由外国传教士开创,中国人这才逐渐知道新闻传播应该是怎么回事。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国内近代报刊业才出现一些高潮。但是,好景不长,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报刊只有到国外寻求发展。直到清末被迫“立宪”,实行新政,国内新闻传播业才得以再次繁荣。辛亥革命后,新闻界很快又遭遇袁世凯的“癸丑报灾”及其他军阀的一些压制。期间,包括新闻界工作者在内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进行了顽强的抗争,演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页。

② 《陈力丹自选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142页。

出极为壮观的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后,国民党又搞一党专政,企图用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统领新闻传播领域。新中国成立后,新闻界的发展依旧步履蹒跚,跌跌撞撞,没有一个正常的运作体制,从反右运动至“文革”的十年浩劫,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几乎丧失殆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界重新整顿,虽略显生机,但问题依然不少。中国新闻界需要对自己的历史进行深刻反省,认真总结。

笔者在为本校新闻专业学生教授中国新闻史课程的数年时间里,选用过好几种权威的教材,也参考过许多有关的教辅用书,然而都不能令人满意,总体上缺乏一种开拓性的、多角度的、多层面的研讨氛围,大都是用一种几乎众口一词的教条在说教。所以,笔者决心自己啃一啃这块硬骨头,希望能实事求是地多方位叙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笔者广泛搜集材料,努力深入挖掘,并注意论说逻辑清晰,坚持学术个性,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完成这本教材。因为许多方面材料的搜集如今已相当困难,对一些新闻史实的客观评判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教材中有许多内容仍需不时进行修改、补充。希望同行、专家们能不吝赐教,提出中肯的批评意见,使本教材在今后的修改中能更上一层楼,以为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杨师群

2007年 猿月于华东政法大学

目摇摇录

第一章摇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	(员)
摇摇一、先秦时期的信息记载与传播	(员)
摇摇二、汉魏时期的官报与信息传播	(源)
摇摇三、唐代官报与信息传播	(远)
摇摇四、宋代报业及相关制度	(愿)
摇摇五、元代的信息传播活动	(员)
摇摇六、明代报业及有关制度	(员)
摇摇七、清代中期前的报业与制度	(员)
摇摇八、中国古代新闻传播的特点	(员)
第二章摇晚清洋人创办中文报刊	(圆)
摇摇一、在南洋开创中文报刊	(圆)
摇摇二、在中国南部发展新闻报业	(圆)
摇摇三、上海外国人报业的崛起	(猿)
摇摇四、在华外报网的逐渐形成	(猿)
摇摇五、有关的文化评价与探讨	(猿)
第三章摇国人办报与维新运动	(圆)
摇摇一、从译报跨越到办报	(圆)
摇摇二、王韬与香港《循环日报》	(源)
摇摇三、精英新闻思想剖析	(源)
摇摇四、报业实际运作之概况	(缘)
摇摇五、维新运动与首次办报高潮	(缘)
摇摇六、维新名人与报业贡献	(缘)

第四章 摇改良与革命的二重奏	(远园)
摇摇一、改良派在境外的办报活动	(远园)
摇摇二、国内改良派报刊浏览	(远源)
摇摇三、革命报刊在海外的发展	(远愿)
摇摇四、国内革命派报刊的奋斗	(苑园)
摇摇五、两派论战与第二次办报高潮	(苑源)
摇摇六、改良派的新闻报刊思想	(苑苑)
摇摇七、革命派的新闻报刊思想	(苑愿)
第五章 摇清末官报与新闻法制	(愿园)
摇摇一、晚清官报与政治信息流通	(愿园)
摇摇二、从戊戌变法到宣布“新政”	(愿愿)
摇摇三、清廷迫害报人有关案例	(愿元)
摇摇四、清末新闻法制进程简介	(愿缘)
摇摇五、清末新闻法制的一些特点	(愿愿)
摇摇六、新闻报人反抗斗争诸例	(愿元)
第六章 摇民国初期新闻业的波折	(员园园)
摇摇一、初年的短暂繁荣与党报堕落	(员园园)
摇摇二、袁世凯对新闻事业的摧残	(员园远)
摇摇三、民初三大名记者	(员园怨)
摇摇四、北洋政府新闻法制状况的紊乱	(员员园)
摇摇五、新闻界的顽强抗争	(员员源)
摇摇六、通讯广播与私营报业	(员员苑)
第七章 摇新文化运动与新闻报刊	(员员园)
摇摇一、社会背景的有关分析	(员员园)
摇摇二、陈独秀与《新青年》	(员员猿)
摇摇三、《每周评论》与李大钊	(员员缘)
摇摇四、胡适及其有关报刊	(员员苑)
摇摇五、《现代评论》与现代评论派	(员员怨)
摇摇六、其他主要报刊与观点争论	(员员园)
摇摇七、新闻学研究教育的开端	(员员猿)

摇摇八、新闻界名记者画像	(页码)
摇摇九、主要成就与思想局限	(页码)
第八章 摇摇革命新闻事业的开端与挫折	(页码)
摇摇一、共产党成立前的有关报刊	(页码)
摇摇二、共产党成立初期的革命报刊	(页码)
摇摇三、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新闻报刊	(页码)
摇摇四、中共党团报刊体系的建立	(页码)
摇摇五、进步报刊与工农群众运动	(页码)
摇摇六、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前后	(页码)
第九章 摇摇国民党统治早期新闻业	(页码)
摇摇一、国民党新闻宣传系统	(页码)
摇摇二、国民党新闻统制政策与立法	(页码)
摇摇三、共产党报刊及左翼新闻活动	(页码)
摇摇四、史量才和《申报》	(页码)
摇摇五、《大公报》及其办报方针	(页码)
摇摇六、成舍我与《民生报》、《立报》	(页码)
摇摇七、自由主义诸刊物	(页码)
摇摇八、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	(页码)
摇摇九、邹韬奋与《生活》周刊	(页码)
摇摇十、新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页码)
摇摇十一、新闻业其他相关概况	(页码)
摇摇十二、记者节与“新生事件”	(页码)
摇摇十三、新闻业发展的有关分析	(页码)
第十章 摇摇抗日战争时期的磨炼	(页码)
摇摇一、抗战时新闻界概况	(页码)
摇摇二、获新闻奖的《大公报》	(页码)
摇摇三、精彩纷呈的《新民报》	(页码)
摇摇四、《新华日报》及其民主自由精神	(页码)
摇摇五、中共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页码)
摇摇六、沦陷区的新闻界概况	(页码)

摇摇七、外国新闻工作者在中国.....	(圆园园)	
第十一章 摇摇解放战争时期的概况		(圆园园)
摇摇一、国民党新闻业的膨胀与瓦解.....	(圆园园)	
摇摇二、《大公报》的最后风采	(圆园园)	
摇摇三、储安平的《客观》和《观察》周刊	(圆园园)	
摇摇四、自由主义的《世纪评论》	(圆园园)	
摇摇五、《新民报》的顽强抗争	(圆园园)	
摇摇六、其他民主报刊简介.....	(圆园园)	
摇摇七、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新闻宣传.....	(圆园园)	
摇摇八、共产党解放区的新闻事业.....	(圆园园)	
摇摇九、新闻界抗争与国民党迫害.....	(圆园园)	
第十二章 摇摇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		(圆园园)
摇摇一、解放初期的调整布局.....	(圆园园)	
摇摇二、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历程.....	(圆园园)	
摇摇三、摇摇年反右运动中的新闻界	(圆园园)	
摇摇四、摇摇年“大跃进”的荒诞岁月	(圆园园)	
摇摇五、新闻事业的波动时期.....	(圆园园)	
第十三章 摇摇“文化大革命”时期		(圆园园)
摇摇一、发动初期与新闻界.....	(圆园园)	
摇摇二、个人崇拜的狂热宣传.....	(圆园园)	
摇摇三、夺权斗争与一月风暴.....	(圆园园)	
摇摇四、“文革”小报的兴衰始末	(圆园园)	
摇摇五、继续革命的混沌路程.....	(圆园园)	
摇摇六、十年浩劫的悲凉尾声.....	(圆园园)	
第十四章 摇摇改革开放初期风云		(圆园园)
摇摇一、思想观念的艰难转折.....	(圆园园)	
摇摇二、《中国青年》复刊风波	(圆园园)	
摇摇三、气象万千的早春时节.....	(圆园园)	
摇摇四、风风雨雨的 圆园世纪 圆园年代.....	(圆园园)	

摇摇五、探索前进的新闻传播业.....	(圆 愿)
摇摇六、管理体制与存在问题.....	(猿 园)
 第十五章 摇摇香港、澳门地区概述	(猿 猿)
摇摇一、香港早期新闻业的开拓.....	(猿 猿)
摇摇二、香港中文报刊的发展.....	(猿 缘)
摇摇三、中资与台资对峙时期.....	(猿 怨)
摇摇四、香港新闻界几大事件.....	(猿 园)
摇摇五、回归前后的香港报业.....	(猿 缘)
摇摇六、通讯、电台、电视诸业.....	(猿 苑)
摇摇七、新闻媒体管理及新闻教育.....	(猿 怨)
摇摇八、澳门新闻传播述略.....	(猿 园)
摇摇九、港澳新闻传媒的特点.....	(猿 园)
 第十六章 摇摇宝岛台湾新闻简史	(猿 缘)
摇摇一、早期新闻报业的发展轨迹.....	(猿 缘)
摇摇二、国民党退守台湾初期.....	(猿 苑)
摇摇三、严厉控制与奋力反抗的较量.....	(猿 园)
摇摇四、雷震与《自由中国》案	(猿 猿)
摇摇五、《文星》李敖案与柏杨案	(猿 愿)
摇摇六、圆园世纪 苑园—愿园年代的转型期	(猿 园)
摇摇七、现代台湾新闻传播格局.....	(猿 缘)

第一章 中国古代理的新闻传播活动

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 ,主要是围绕“官报”的产生与运作的一些话题。所谓的“民报”也主要是“官报”的翻版 ,民间非法小报实在微不足道。需要强调的是 ,中国古代官报与近代新闻报业存在着质的区别 ,不能混为一谈。

一、先秦时期的信息记载与传播

远古人类交流信息主要靠语言和符号 ,用语言叙述传播较为复杂的事情 ,用打手势、喊叫等方式传递简易消息 ,如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使用过的经过加工的海蚶壳 ,青海民和县阳山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制喇叭筒等。为了将信息传播得更远、更久 ,人们开始将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用便于记忆的语言编成歌谣、口诀 ,一些生动的故事代代相传 ,便成为传说。当然 ,随着时间的推移 ,故事会走样而失实。同时 ,人们又摸索出一些便于记忆和传递的新方法 ,如结绳、击物、标识、雕刻、图画、符号、书契等 ,这样便逐渐产生了文字 ,由口头信息过渡到手写信息。

从殷墟甲骨文中可以发现几种原始的通讯方法 : (𠂔) 击鼓报警。《甲骨文合集》第 104 号片记载中出现的一个从“女”或从“人”踞跪守“鼓”的字样 ,可能就是击鼓报警方法 ,后发展出用旗鼓指挥进退 ,主要用在军队中发号施令。《孙子兵法》曰 :“言不相闻 ,故为金鼓 ;视不相见 ,故为旌旗。” (𠂔) 远程呼告。《甲骨文合集》第 105 号片记载 :“长友化呼告曰 :工方征于我奠丰 ,七月。”即长友化 (部族或人名) 呼喊报告 :工方 (北边敌国) 在七月侵犯了我边地奠丰。一种军事情报远程接力传呼告急系统在当时可能已经趋于形成。 (𠂔) 刻骨传告。《甲骨文合集》第 106 号片记载 :“庚申卜贞 ,雀无祸 ,南土骨告事 ?”即庚申日占卜询问 :雀 (部族或首领名) 没有祸 ,南方骨告何事 ? 这“骨告”或许是把事情刻写在甲骨上进行消息传递。如果这一估计不错 ,商代可能已出现了原始简明的文字通讯。《尚书·多士》记载 ,周公曾对商代遗民训话说 :“惟尔知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殷革夏命。”这说明商代已有记事典册。

烽燧报警的方法大约也产生于商代,到西周时已普遍用于边防,《史记·周本纪·魏公子传》载有周幽王和魏国信陵君使用烽烟报警的故事。当时还有一种特殊的传播媒介——木铎。《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引《尚书·夏书》称:“每岁孟春,道人以木铎徇于路。”杜预注:“道人,行令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路谣之言也。”即夏商时代有一种被称为“道人”的官员,春天巡行各地,手摇木铎,既宣达政令,也聆听搜集各处的民情传言。近代个别报纸曾以“木铎”作为自己的注册商标,就是这个缘故。

商代除甲骨记事外(主要用于占卜),开始在青铜器上刻铸文字,此风后盛行于周代。金文记事多用于记录帝王诏令或帝王与贵族的有关重要事项,以传后代。至春秋时期,郑国“铸刑书”,晋国“铸刑鼎”,一般史书定性为公布成文法,其实是以此公布和传播国家法律。

史官的源头是巫、卜,史官记事制度到周代已渐趋完备,即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春秋战国时期,以竹简、木牍和缣帛作为文字载体,毛笔也早已作为书写工具。《春秋》这本鲁国编年大事记,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的记载整理编辑而成,其文字简明扼要,且含褒贬之意,近似今天的新闻标题或导语。此外,其中还有官府对民间诗歌的采集活动,有一定的采访性质。《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诗经》中“国风”之大半,当采自民间。

有学者断言:“史官也正是当时的新闻记者……他们那时所记载下来的新闻就成了不可改变的历史记录。”^①话似乎不无道理,然而记者记事是为了传播各种新闻,让百姓了解时事国情,而史官所记国事究竟在当时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传播,却存在一定的问题,后人得以见到的许多史事应有其传播的成分,但其传播面在当时是相当狭窄的,更重要的是史官记事的目的在于为统治者树碑立传和作为国家的档案记录,而采诗官把各地民歌提供给帝王,主要是让帝王从不同侧面了解民情,以稳固统治,虽然同时也丰富了相关的文化生活,传播了一些民意与民风,但却并不是为了传播时事新闻,让百姓了解国情。所以,史官、采诗官与新闻记者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虽然当代史与新闻很难划分,但是史官与记者的职能基本不同,将其混为一谈是不足取的。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史官记事有直笔的传统美德,以下举春秋时期最著名的几位史官的实例:

《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是位十足的暴君,不但厚敛百姓,滥杀无辜,甚至放凶狗扑咬臣属,数次派人暗杀执政大臣赵盾(宣子)。在数次苦谏不改,

^① 甘惜分:《新闻论争三十年》,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

且面临被暗算的境况下,赵盾只得出走。在他还未出境时,大夫赵穿杀了晋灵公。“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对此事,孔子赞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此事中之良史董狐,博得古今一片喝彩。然而,从事实上看,并非“赵盾弑其君”,而且从事理上分析,也应是灵公自取灭亡,即如此暴君实在该杀!如果董狐书“赵盾弑暴君”,倒也情有可原,可惜的是其非但不肯书此“暴”字,且要求赵盾应立即返回“讨贼”。如此偏袒暴君,董狐是一个值得称赞的“良史”吗?其中原因何在?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庄公淫乐无度,大臣崔杼强娶故去的棠公之妻棠姜为妾,庄公也勾搭上棠姜,引起崔杼的怨恨,借机杀了庄公而立景公,自己为相国。“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此事也被誉为中国古代史官不畏强暴、秉笔直书的典范。其实,真正的秉笔直书,至少应加上“庄公淫”三字。为尊者讳竟如此之早就成为中国史官之传统,问题就在于这些史官实际上已成为君主豢养的知识类家臣,从中更可见古代史官与近代记者的职能性质所存在的巨大差异。

周代邮传制度逐步形成,情报信属于国家密件。《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西周初年,太公望在齐杀二居士,“周公旦从鲁闻之,发急传而问之”。这“急传”可能是邮传初期的一种应急方式。《周礼·司徒·行夫》载,周代负责传驿事务的官员称行夫,“掌邦国传递之小事……虽道有难而不时必达”。春秋战国时期,邮传制度应较为完备。《孟子·公孙丑上》引孔子的话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周人有“师行三十”之说,意谓部队行军每天以三十里为程,需支帐露宿。《左传·庄公三年》载:“凡师,一宿为舍。”故三十里又称一舍,“退避三舍”便由此而来。后代多沿袭此制,两驿之间一般距离为三十里。这样,传邮制度便成为两周时期传递官文书信息的主渠道,并为历代所沿袭。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各诸侯国往往需要发布政令或通报军情,因此都设有驿站和邮传,以方便信使往来。这一时期,处士横议,聚徒讲学,弘扬自己的学说,或周游列国,说服君王,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著书立说,记载当时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提出自己的社会理想与治理方案。人们或可在乡校之类的公众场所聚会议事,或可在城镇集市中交换有关经济信息。总之,由于当时统治相对松弛,信息传播活动颇为频繁。

在岩崖上刻字,以传播信息,在周代已盛行,当时主要用于颂德和记功,以垂之久远。最典型的例子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经到各地巡游并多次刻石记功,在泰山刻石,到琅琊台刻石……,到处传播其歌功颂德的信息文字。他统一

文字、修筑驰道等措施,为社会信息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焚书坑儒、禁止私学、思想专制诸政策,也给文化发展、信息传播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另一方面,在当时记载史事过程中存在着掺假问题。1924年,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推翻了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历史系统,将其还原为神话传说。其实,中国上古历史中的许多故事记载,往往把神话传说与历史事件,乃至想象杜撰混为一谈。

比如,家喻户晓的尧、舜、禹禅让故事是否为历史真实?仔细推敲,其首领推举过程中往往夹有暴力争夺的痕迹。《竹书纪年》诸古籍中有关尧、舜、禹之间残酷争夺权位斗争的记载不少,如:“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舜放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可以说,其记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当时历史的真相。此外,尧舜时,鲧违帝命而被害,舜流放尧之子丹朱,益作为继位人而被禹之子启所杀等等,都可以作为当时权位斗争激烈的注脚。《孟子·万章篇》说:“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韩非子·说疑篇》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可见,“舜逼尧”、“禹逼舜”诸故事在当时已很流传,应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再如,秦始皇生父是谁?《史记·吕不韦传》说得活龙活现,吕不韦与赵姬有孕后,再将赵姬献给子楚,子楚回秦国继承王位,后传位给子政。于是,《汉书》径称嬴政为“吕政”。由于没有旁证,明代王世贞提出两种可能:(员)是吕不韦为使自己长保富贵,故意编造;(圆)是吕不韦门客骂秦始皇以泄愤,而编造此说。当然,王世贞也只是猜测。

中国古代史事记载与传播存在着许多后人的编造掺假成分,真伪难辨。

二、汉魏时期的官报与信息传播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认为,西汉已有“邸报”,根据是《西汉会要》卷六十六《百官表》“大鸿胪属官有郡邸长丞”,颜师古注:“主诸郡之邸在京师者也。按郡国皆有邸,所以通奏报,待朝宿也。”即各个郡国在京城都设有“通奏报”的“邸”(地方在京办事处),而“通奏报云者,传达君臣间消息之谓,即‘邸报’之所由也”^①。邸的职能是上呈章奏,下报上情,中转信息,招待来京地方官的食宿等,负责人是郡邸长丞。大鸿胪是中央政府接待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使节的主官,郡邸长丞是其属官。这说明,当时中央与地方的接待、通报诸事务融合发展。有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学者指出,《汉书》中有燕王旦在封地获知都城御林军调动的情况记载,而推测其有可能从当时的“邸报”上得到了这一消息。^[1]世纪初,英国探险家史坦因在新疆地区沙漠中发掘出一批西汉年代的官文书,内有简书的“边报”。有学者对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进行研究,发现其中抄录了不少皇帝制书和大臣奏记,总之有许多国内外的信息,认为其应具官报性质。然而,在汉代有关记载中,“邸报”并未出现,所以多数学者仍认为当时还没有建立发布官报的正常体制。

在东周应该已产生官方用正式文告发布天下的相关制度,到秦汉时已普遍使用。如秦朝末年,刘邦入关与民“约法三章”,即是布告政令。西汉元狩年间(公元前117—111年),汉武帝封萧何曾孙萧庆为酈侯,为此公告全国。《汉书·萧何传》载:“武帝元狩中,复下诏御史,以酈户两千四百封何曾孙庆为酈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报萧相国德也。”这类事情也可能由中央以文件形式向地方发布。

汉代邮传已有法律制度给予一定的规范。《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行书律》规定:“十里置一邮。南郡江水以南,至索南水,廿里一邮。”《汉书·平帝纪》颜师古注:“邮,行书舍也。”即邮站。汉代里里约合今1.25里,就是1250米。一般125里约12500米,就设一邮站。南方地区约是125里设一邮站。“北地、上、陇西,卅里一邮。地险狭不可邮者,得进退就便处。”西北地区约是125里设一邮站。地势险要处就便设邮站。“邮各具席,设井磨。吏有县官事而无仆者,邮为炊;有仆者,假器,皆给水浆。”邮站主要是为邮人或官吏提供食、宿及交通工具。“邮人行书,一日一夜行二百里。不中程半日,笞五十;过半日至盈一日,笞百;过一日,罚金二两。邮吏居界过书,弗过而留之,半日以上,罚金一两。书不当以邮行者,为送告县道,以次传行之。诸行书而毁封者,皆罚金一两。”^[2]“复蜀、巴、汉中、下辨、故道及鸡中五邮,邮人勿令徭戍,毋事其户,毋租其田一顷,毋令出租、刍藁。”邮人获免田租一顷及免徭戍的待遇。

西汉发明造纸术,到东汉蔡伦加以不断改进,时称“蔡侯纸”。然而,当时造纸的数量还很有限,主要还是用笔墨书写在简、帛之上,有关文书还是难以广泛传播。清人孙毓修著《中国雕版源流考》认为:“竹帛废而纸大行,当在魏晋间矣。”从存世的文献资料和地下出土的文物看,魏晋时用得最多的还是简牍,其次是纸,最后是帛。这主要还是从成本考虑,帛的成本最高,而掌握纸张制造工艺的工匠还不多,其产量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直到公元166年,东晋桓玄下令废简用纸,才开始了纸张作为主要传播载体的历史。

三国魏晋历时近二百年,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时局纷扰。诸国之间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交往错综复杂,诸国政治家都有强烈的信息需求,都注意搜集对方各方面的情报,十分重视有关的信息传播,因为这往往与交战双方的胜负关系

密切。各国都很重视驿传网络,以便及时获得有关信息。刘备为了与魏、吴作战,曾在成都至汉中与成都至夷陵二线修了不少驿站。孙权在境内也广设驿站,史称“驿使往来,冠盖相集”。曹魏的驿站制度最为周全,曾制定过单行法《邮驿令》,驿传网络四通八达,其驿传速度可达一日行四百里。所以,在《三国志》一书中,“消息”一词被使用达数十次。

魏晋南北朝时,政府广泛使用布告和露布。《三国志》和《三国会要》中经常提到以政府文告“布告天下”,内容主要为行政法令,一般是在固定地点张贴。露布则是一种以流动方式传播消息的方法,主要用绢帛或木板,大多传播军事信息,或发布政治檄文,尤其是在宣传战争胜利的时候。《封氏闻见录》卷四载:“露布,捷书之别名也。诸军破贼,则以帛书建诸竿上,兵部谓之露布。”据魏晋时期有关文献资料的记载和相关考证,当时依然没有建立发行官报的正常体制。

三、唐代官报与信息传播

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唐代初期有官报的记载。一般认为,古代官报发行的地方体制雏形产生于唐代中期,即“进奏院状报”的出现。怨世纪初,各地节度使发展到四十几个,藩镇割据后,皆置邸于京师,或称上都留后院(简称“留邸”)、上都知进奏院(简称“进奏院”)。其长官称留后使或进奏官,泛称邸使或邸吏,只对派遣他们的藩镇负责而不受朝廷管辖,职掌呈递章奏、接转朝廷文书及相关事宜。柳宗元在《邠宁进奏院记》中说,其长官可以“稽疑于太宰,质政于有司”,能“历阊阖,登太清,仰万乘之威而通内外之事。”可见,进奏官可了解许多朝廷政务,并可向地方传达京城的消息。为满足地方及时了解朝廷政事动态的需要,由进奏院编抄的“进奏院状报”应运而生。该状报不定期地由进奏院向地方藩镇传发,其信息大多为国家政事活动,主要是筛选朝廷的消息文告进行抄发,也有部分是进奏官们自行采集的,时间上往往要早于正式发布的朝廷官方文书。

唐人崔致远在《桂苑笔耕集》中记载了进奏院状报的许多具体内容,如朝廷改年号、册封官位爵号、与边界少数民族的通和贸易等。进奏院状报的别称、简称很多:《李义山文集》卷一《为濮阳公论皇太子表》中别称“进奏院状”,《全唐文·为田神玉谢兄神功于京兆府界择葬地表》中别称“上都留后状”,孟棨《本事诗》中别称“留邸状报”,《旧唐书·李师古传》中别称“邸吏状”,刘禹锡代杜佑所作《谢男师损等官表》中简称“状报”,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十七《论幽州事宜状》中简称“报状”,杜牧《樊川集》卷十二《与人论谏书》简称“报”。这么多称呼,实指一样东西。需要注意的是,“报状”、“状报”、“状”、“报”等简称,当时也被用来泛指一些官文书或私人书信。

最有争议的文字记载是孙樵《经纬集》卷三《读开元杂报》。孙樵,字可之,一作隐之,关东(陕西关中以东)人,约生活在唐宪宗至唐僖宗时期,中过进士,担任过宣宗时期的中书舍人和僖宗时期的职方郎中诸官职。此文作于宣宗大中五年(855年),谈到前段时间他在湖北襄汉一带闲居,看到“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之杂报,内载“条布于外”的“开元政事”“凡数十百条”,后“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孙樵所举“杂报”中的国家政事,大都发生于开元十二年至二十三年间(724—735年),很可能就是开元年间流布于外的进奏院状报。唐时,襄汉地区隶属山南道,估计就是当时都城山南道进奏院的邸吏们传发给其地方长官的状报,或是相关抄件。也有学者认为,这“开元杂报”是当时中央朝廷所编发的政府公报性质的官报。

由于没有记载任何官报的款式和名称,也没有记载固定的刊期与报头,对于如何解释这“杂报”和“条报”,新闻史界意见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近似于进奏院状报之类的报纸,所以中国有官报的时间不会晚于开元年间。有学者认为,这应属于开元和大中年间的政府文告,“杂报”还不能算新闻报纸,“条报”实为动词。其实,中国古代官报本身就是政府文告与新闻报纸的杂交儿,两者没有严格的界线。所以,中国古代形成的是政府文告与新闻报纸结合的一种文化传统,它对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现存的唐代两份官报,是1906年在敦煌莫高窟出土的两张进奏院状报的残页,1906年前后被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从敦煌掠走。现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的一份,是唐僖宗光启三年(893年)前后,随驾进奏官从凤翔发给归义军节度使(在沙州)的状报,是一张长87厘米、宽13厘米的横条卷。全状开头部分较完整,有“进奏院状上当道”等字样,残存有12行字,后半部已佚,记载归义军所派专使在兴元、凤翔两地向朝廷要旌节的情况。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的一份,是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前后,驻京进奏官从长安发回归义军节度使的状报。这份进奏院状较为完整,共12行,以“上都进奏院状上当道”开头,用“年、月、日谨状”结束,报道了归义军所派贺正专使在京活动的情况。两份状报均属敦煌文物,史界称“敦煌进奏院状”,它们实际是我国,也是世界上仅存的年份最早的原始报纸。

综上所述,唐代主要是出现了地方驻京办事处各自编发的保留着官文书痕迹的进奏院状报,它或在京城和地方官僚中传阅,也或在一些关心时事的各地士人中传播,然而不见有中央政府统一管理下正式向地方发行的“邸报”体系。孟棻《本事诗·情感》有“留邸状报制诰阙人”之句,《全唐诗话》中将其改为“邸报制诰阙人”,后者为宋人尤袤所著,并非唐代第一手资料,估计是用了宋代概称,所以唐时并无此“邸报”之简称。